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周文革,范雨竹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关键词]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科学论”;“艺术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5-0112-05

On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of Modern China’s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istic Approach”

ZHOU Wenge, FAN Yuzh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in 1840,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 in the theoretic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They all focused on whether the translation is an activity of science or an activity of artistry.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sprou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free translation was in the dominant place. The artistic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aesthetics. These two approaches had jointly formed the distinctive translation theory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artistic approach” has not only helped to reform the society of modern China, but also promoted the variations of vernacular norms. Thus, the translation study in China went towards a systematic trend and gradually grew matur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ranslation theory; “scientific approach”; “artistic approach”

中国近代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期和文化的转型期,也是翻译活动异常繁荣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震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由此“经世致用”“师夷长技”的思想使国人的目光投向西方,一大批科技、政治、伦理、社会、文学等著作被译入国内,中国的译事活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在救亡启蒙这一宏大的诉求之下,无论是原作的选择还是译本的呈现,都称得上是“百花齐放”,不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译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我国翻译学在这一时期逐渐显出雏形,形成了从语言科学角度切入翻译活动的“科学论”和从艺术审美角度探究翻译实

实践的“艺术论”两大理论体系,直击“科学性”与“艺术性”两大翻译本质特征,“科学性”与“艺术性”由此成为我国近代翻译理论发展的两条主线。

一 翻译“科学论”的萌生:“科学性”之奠基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被动地与西方世界进行交往,这种“后发外生”型的文化转型促进了译介活动的发展。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力推动译介活动,建立译所,翻译西书。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翻译成果不断被推广,学者对于具体的翻译专题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翻译“科学论”的萌生便是其中形成的先进成果。纵观翻译“科学论”的萌生,不能不提及两位代表性人物,即傅兰雅与马建忠。两人的翻译思想为近代中国翻译科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傅兰雅是近代西学东渐的巨擘之一,他对中国近代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具有重要意义。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翻译官期间,翻译出版了160余部西学书籍,是近代翻译西书最多的人之一。^{[1]133}

傅兰雅明确提出了“名目生新”的翻译主张,认为“译西书第一要事”乃是译名。他提倡的术语翻译原则有三条:(1)采用“华文已有之名”,即采用中文已有的名词,包括在中国传统著作和先前西方人所著科学、工艺书籍中能查找到的名词,或在华外商、技师等人可能正在使用的名词。(2)“设立新名”,即中文没有现成名词的情况下,创立新名词。具体办法有三,即造字、意译和音译。其中造字法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平常汉字添加偏旁成为新字,如镁、矽;二是利用字典中已有但并不常用的汉字,对其赋予新义,使其成为新的名词,如钾、锌。(3)“作中西名目字汇”,即编辑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表附于文后,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核查,一定时期之后还需汇成完整的名目总表,以此避免产生译名混乱。^{[1]136}傅兰雅不遗余力地推动术语的统一,并号召整个译界重视译名混乱的问题。他对西方术语翻译规范化的追求蕴含着其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在科技翻译中,他提倡意译,将音译法作为最后的选择,倡导人们不去剥夺汉语文字本身所赋有的表意魅力,并相信汉语完全能够表达出西学的奥义。

除却在译名规范化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之外,傅兰雅还论述了科技书籍的翻译方法。在当时“险

象环生”的翻译环境之下,傅兰雅所思考的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前沿性,他的翻译成果和翻译理念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为人们深刻认识和了解翻译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由此点亮了走向翻译“科学性”的一盏指明灯。傅兰雅曾担任由来华传教士成立的益智书会委员会主席,负责中国教会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他在学会的年度大会上呼吁学界团结起来、共同为统一术语系统而努力,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响应,专门的术语委员会得以成立,中英文术语对照表终于在1904年得以出版,为统一的术语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译名原则与方法无疑具有较高的示范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也是其所翻译的64种化学元素名称中有45种沿用至今的原因。

翻译“科学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性,承认源语文本的客观制约性,并在翻译时遵循客观忠实和逻辑分析的原则。中华民国以前,维新派人士为翻译“科学性”的延伸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马建忠。他所提出的“善译”翻译观包含着十分前卫的现代语言学理念,他是主张将读者反应纳入译文优劣的评判中,可谓开创近代翻译读者中心论的先河。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主体的翻译理念对翻译“科学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拟投翻译书院议》一文中,马建忠阐释了“善译”的观点。一是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从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文字的生成渊源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来了解二者的异同;二是在翻译时应注意传达出原文的“意旨”“神情”与“语气”;三是译文要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即重视读者和读者反应,认为只有使读者有所收获或读来与原文无异的翻译方可称为“善译”。

“善译”理论介入翻译研究的视角是科学理性的。首先,“善译”要求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对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进行语符层面的对比分析,而后从句法学层面“析字句之繁简”。其次,“善译”讲求的“审其音声之高下”是从音系学角度审视译文是否传达出原文的语气、声调和重音等。最后,“善译”所重视的“所有相当之实义,委屈推究”、审度“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实际上是从语用学层面对译文的考量。有学者称马建忠的“善译”理

论“标志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理念已发生了显明的嬗变和衍化,为传统译论开辟了一条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主体的西学之路”^{[2]89}。

在关注文本转换的中国传统译论面前,“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的“善译”理论开创了读者中心范式的先河。强调“案本、求信”的中国传统译论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都是语言和文本的转换,“善译”的翻译观不仅具备科学主义的语言观指向,同时将读者纳入翻译学本体的研究中,这样的创新令人惊喜,也符合未来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范式走向读者中心论范式的发展趋势。^{[2]92}

马建忠及其“善译”翻译观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研究相对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但遗憾的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视角未能激起太大的波澜,“科学论”刚刚萌生便停滞不前,而遵从中国传统译论美学观念、人文观念的“艺术论”渐渐成为翻译界的主要论调。

二 翻译“艺术论”的确立:“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演进与“神韵”翻译观的形成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和工具化。人们对翻译的定义十分宽泛,因此造就了以“挪用和改写”为时尚的晚清翻译。^{[3]20}随着翻译活动的不断开展,译者也不断对翻译经验进行总结,翻译思想愈发成熟。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便是其中具有总结性和概括性的翻译思想,直观地揭示了翻译的另一个根本性质——“艺术性”。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以外,求其尔雅。”^{[4]136}“信”是第一要义,但“信”而不“达”,便是不“信”,为“达”即为“信”。可见“信”“达”“雅”三者是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的。

这一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继承了古代佛经翻译的“案本、求信”原则;另一方面,在“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译文的练达和可接受程度,强调内容与风格的统一。但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也并非十全十美。首先,广义上“信”的概念是多方面的,从语言到风格乃至模仿原文语言形态的实实在在的“信”,才能达到准确地忠于原文,这也造成了“信”与“达”“雅”间的矛盾。而严复本人在翻译实践中,也并未践行他所提出的以“信”为第一要义的翻译

标准。有学者基于《天演论》的变译语料库对严复的译文进行了考证,统计显示“全译策略所占比例不足1%”^[5]。其次,所谓“雅”就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讲求“藻蔚”,那么“雅”与“信”“达”之间的统一也就引发了保持原文内容方面“信”且“达”的矛盾,即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统一。^[6]原文不雅,译文便无法求雅;译文若“雅”,又违背了“信”这一层标准。但总的来说,“信达雅”一直被翻译界奉为主臬,后代学者对这一标准或赞同或否定的态度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和研究,构成了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其研究也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发展。

“信达雅”标准的提出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细化。以往由经验主导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转向对直译与意译等具体化课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白话文的译文语言选择逐渐明确,对于“信”与“达”的讨论以及关于“意译”与“直译”的讨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鲁迅早期受林纾影响较深,其《月界旅行》《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等作品全部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且意译和改写的手法较为常见。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鲁迅曾多次对“信”这一概念抒发己见,他曾在《小约翰》译本的引言中写到:“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4]305}鲁迅认为“信”是创作和翻译的本质区别。鲁迅所坚持的“宁信而不顺”,与他希望翻译活动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改变密不可分。他迫切希望从外国“窃火”,推动白话文发展,引进新的表达方法和新思想,从而达到改造中国文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鲁迅的翻译思想逻辑清晰,他企图以直译乃至“硬译”的方式输入原质的外国文化,对于“不顺”的译文,他希望读者能够硬着头皮、耐着性子读下去,因此他的译本失去了众多读者,翻译理念也为不少学者所诟病。

同鲁迅一样,瞿秋白也将“信”作为翻译的首要准则。瞿秋白曾说:“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7]但在“信”与“顺”的关系上,他却不同意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瞿秋白认为应使用“绝对的白话”即令人读得懂的白话来翻译文学作品,“不顺”也就丧失了原作的精神。可以说,鲁瞿二人的翻译理论都是对“雅”的不同程度的修正。严复追求的“雅”倾向于古雅,瞿秋白对于“雅”的理解是舍弃雕琢和修

饰;鲁迅则是一种原本位观,他更希望原文的语言形式能在汉语文化中扎根。鲁瞿二人都采取直译的翻译观,坚持以白话文译文,都十分重视翻译活动对于改造中国语言文字和注入新思想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即便在“信”与“顺”的关系上有所分歧,但其目的殊途同归。

作为传统译论“质直”“文丽”之争的进一步发展,鲁迅和瞿秋白二人对“信”和“顺”关系的探讨以及鲁迅从“意译”到“直译”翻译观的转变,反映了人们正逐渐意识到双语转换之间所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以及人们为解决这种矛盾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茅盾原则上赞同直译,并把直译和死译区分开来。他认为“直译”的意义不仅在于不任意更改原文字句,而且通过“直译”尽力保留原作的风格和情调。在翻译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超出内容与形式的翻译“神韵”的作用开始被人们所重视,而提出翻译“神韵”说的人正是茅盾。他认为:“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构成‘形貌’的要素是‘单字句调’两大端,这两者同时也造成了该篇的‘神韵’。”撇开“神似”与“形似”的不同,茅盾总结翻译文学作品要注意两个要件:“(1)单字的翻译正确。(2)句调的精神相仿。”^{[4]338}“神韵”说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其历史根源与中国古代诗画同源,在“神韵”“风韵”等术语上不难看出“古代标举‘禅悟’的诗评家严沧浪、王渔洋等人的痕迹和顾恺之、苏东坡论诗画的影响”^[8]。较近的根源可追溯到清朝初期《繙清说》中魏象乾所提到的译文应该“传其神”。茅盾认识到“神韵”是由“单字”和“句调”所构成,这一点意义深远。“形貌”和“神韵”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而是相辅相成的。

陈西滢也曾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形似、意似、神似”的“三似”说。陈西滢认为翻译中怎样才算是“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从画家和雕刻家的角度,借雕塑和肖像的相似程度来比喻翻译中的“信”:在肖像画里,不熟识本人的他者觉得十分相像,家人和朋友却说不像,这种相像即为“形似”,而“形似”是最低水平的“信”;若家人朋友与画家都觉得惟妙惟肖,则为“意似”;若艺术家与善于观察的人都觉得是佳作,才可称为“神似”,此乃最高境界的“信”。在陈西滢看来,“形似”的翻译只能译得出内容,却译不出风格;达到了“意似”境界的翻译才可译得出风格。“三似”的翻译观注重

作者与译者在才情与感受方面的契合,聚焦于创作主体和翻译主体,认为二者的相似才可译出“神韵”。“三似”说将“神韵”看成是读者的一种心理感受,并将读者的差异纳入翻译研究的考察范畴。

郭沫若和林语堂也曾就“神韵”问题各抒己见。郭沫若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的译作是上乘之作,若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仍不失为佳作。虽然郭沫若主要论述的是诗歌翻译,但他也同时认为保存“风韵”的译法应适用于所有文学翻译。林语堂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的观点,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4]329}他所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与严复的“信达雅”标准相比,内涵更丰富。

“神韵”的实质可理解为一种超越了内容、形式和文体风格的更高层次的“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读者的感受差异性都是影响“神韵”传达的因素。对“神韵”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是对严复“信达雅”翻译观的延伸和发展,由此,翻译走入美学与艺术范畴,其“艺术性”日渐浓厚,“神韵”翻译观的形成和“翻译是一种艺术”的认知使得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另一条主线——“艺术论”变得日益明晰和成熟。

三 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历史地位及社会影响

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和翻译“艺术论”的确立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时间点,二者是同时向前发展变化的两条主线,共同推动着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构建。一方面,翻译“科学论”和“艺术论”确立了以全方位的“信”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从傅兰雅对译名统一的强烈呼吁,到马建忠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介入翻译,使得翻译的科学性为人所知且深入人心。以新文化运动为转折点,译界关注的焦点从外部转向了内部,晚清意译和达旨的风气得到了纠正,人们开始追问翻译的本质。无论是对“直译”“意译”的争论还是“神韵”翻译观的成熟,译者逐渐意识到“信”是“求真”,也是对作者、读者负责。另一方面,翻译“科学论”和“艺术论”是翻译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受其影响,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地论述翻译事业的重要性和功能性,学界越来越重视具体的课题研究,我国的翻译研究也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这无疑

无论是翻译的“科学论”还是“艺术论”,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寄希望于通过译事来改造社会。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从对古雅的坚守到五四运动之后对新文化的开拓,体现了译事活动对中国现代性的塑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始走向民族解放的苦难历程,知识分子抱着救亡图存的宏伟目标译介西学,译事活动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严复将译书同救国紧密相连,在他看来,“开民智”“隶贫弱”“求进步”“杜杂庞”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9]因此,他翻译了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书籍,企图为中国民众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系统和全新的世界观。五四时期,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被迫害民族的文学作品被译入国内,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矛盾和人民苦难的根源的思考。以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代表所开展的曲线救国的翻译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史。

翻译的“科学论”与“艺术论”的论争催生了中国全新的语言观。从晚清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我国的语言处于一种剧烈的变动之中,不同翻译思潮、翻译策略和语言表达此消彼长。^{[3][112]}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为例,二人都使用文言文翻译,但严复使用的文言句法更偏向古雅,林纾使用的文言文则要平白得多,并且大量借用外来词汇,甚至有明显的翻译腔存在。林纾用文言文翻译长篇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实际上体现的是文学翻译语言的变革,此时的文言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口语化和欧化特征。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坚持白话文翻译,多次强调翻译对于创造中国现代白话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对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和“信”与“顺”的争论实际上也映射着文言文要不要“变”、要不要“欧化”的论争。通过直译的方法译介西方文学,以此来借鉴西方的文法字法,模仿西方的语言形式,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成长。翻译活动除了为白话文的语言规范引进新词外,同时也为白话文规范提供了试验的场所,新的语法结构、表现形式以及新概念、新思想通过翻译活动糅杂进汉语之中,也融入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中,译

介活动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以客观规律性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科学论”和以主观创造性为主要特征的翻译“艺术论”在这一时期从萌芽走向成熟。以傅兰雅、马建忠等人为首的翻译家和语言学者将西方的语言分析模式引入中国,给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注入了“科学性”;尔后以严复、鲁迅、茅盾等人代表的翻译家从翻译策略的角度提出的“直译”与“意译”的概念,也逐步演化为具有中国传统美学和人文主义指向的“神韵”翻译观。

厘清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需要深入理解其历史语境以及社会背景。^[10]可以说,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两条主线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改造作用,更推动了白话文语言规范的变革。从翻译角度看,翻译的“科学论”与“艺术论”确立了以全方位的“信”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使翻译研究的课题更加具体细致,使译介对翻译本质的追寻更加深入,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孙邦华. 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4).
- [2] 王洪涛. 中国传统译论基本理念的嬗变与衍化:马建忠“善译”理论之现代诠释[J]. 外语学刊, 2005(1).
- [3] 廖七一.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4] 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5] 黄忠廉. 达: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J]. 中国翻译, 2016, 37(1): 34.
- [6] 易经, 谢楚.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脉络[J]. 武陵学刊, 2012, 37(4): 127.
- [7]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311.
- [8] 朱志瑜.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J]. 中国翻译, 2001, 22(2): 4.
- [9] 谭素琴. 近代翻译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的影响研究[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5(3): 62.
- [10] 杨司桂. 再论奈达翻译理论之属性[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2(2): 117-121.

责任编辑:徐海燕